

中华野史

康雍乾间文字之狱

（清）佚名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康雍乾间文字之狱

清·佚名撰 著

○ 庄廷鑑之狱

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，尝著《明史》，举大经大法者革之，已刊行于世，未刊者为《列朝诸臣传》。国变后，朱氏家中落，以藁本质千金于庄廷鑑。廷家故富，因窜名己作，刻之。补崇祯一朝事，中多指斥昭代语。岁癸卯，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，谋以告讐为功，藉此作起复地，白其事于将军松魁。魁移巡抚朱昌祚，朱牒督学胡尚衡，廷鑑并纳重赂以免，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。之荣计不行，特购得初刊本上之法司。事闻，遣礼部侍郎出谳狱。时廷鑑已死，戮其尸，诛弟廷钺。旧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，亦伏法，并及其四子。令哲幼子年十六，法司令其减供一岁，例得免死充军。对曰：“予见父兄死，不忍独生。”卒不易供而死。序中称旧史朱氏者，指文恪也。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，遂嫁祸，且指其姓名以证，并诛其五子。松魁及幕客程维藩，械赴京师，魁以入议仅削官，维藩戮于燕市。昌祚、尚衡贿谳狱者，委过于初申覆之学官。归安、乌程两学官并坐斩，而二人幸免。湖州太守谭希闵，莅官甫半月，事发，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，罪至绞。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，闻阖门书坊有是书，遣役购之，适书贾他出。役坐其邻一朱姓者少待，及书贾返，朱为判其价。时主事已入京，以购逆书立斩。书贾及役斩于杭。邻朱姓者，因年逾七十免死，偕其妻发极边。归安第元锡方为朝邑令，与吴之鏞、之铭兄弟，尝预参校，悉被戮。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。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。惟海宁查继佐、仁和陆圻，当狱初起，先首告，谓廷鑑慕其名，列之参校中，得脱罪。是狱也。死者七十余人，妇女并发边。

盖浙之大吏及谏狱之侍郎，鉴于松魁，且畏之荣复有言，虽有冤者不敢奏雪也。之荣卒以此起用，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。后仕至右佥都。

○戴名世之狱

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，后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试，与之有私，并去官遣戍。遇赦，归入滇，受吴逆伪翰林承旨。吴逆败，孝标先迎降得免死。因著《钝斋文集》、《滇黔纪闻》，极多悖逆语，戴名世见而喜之。所著《南山集》多采录孝标所纪事，尤云鶚、方正玉为之捐资刊行。云鶚、正玉及同官汪灏、朱书、刘严、余生、王源皆有序。板则寄藏于方苞家。都谏赵申乔奏其事，九卿会鞫终，戴名世大逆，法至寸磔，族皆弃市，未及冠笄者发边。朱书、王源已故，免议。尤云鶚、方正玉、汪灏、刘严、余生、方苞以谤论罪绞。时方孝标已死，以戴名世之罪罪之，子登峰、云旅，孙世樵并斩。方氏有服者皆坐死，且剖孝标尸。尚书韩菼、侍郎赵士麟、御史刘灏、淮扬道王英谟、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，并别议降谪。疏奏，圣祖恻然，凡议绞者改编戍，汪灏以曾效力书局，赦出狱；方苞编旗下；尤云鶚、方正玉免死，徙其家。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。韩菼以下，平日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。是案也，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。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。

○查嗣庭之狱

雍正四年，江西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查嗣庭，试题曰“维民所止”。有讷者谓“维止”二字，是取“雍正”二字去其首也，狱遂起。今将当时上谕全录，于此事始末可见矣。

雍正四年九月乙卯，谕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：“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。隆科多曾经荐举。朕令在内庭行走，授为内阁学士。后见其语言虚诈，兼有狼顾之相，料其心术不端，从未信任。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，蔡珽又复将伊荐举，今岁各省乡试届期，朕以江西大省，须得大员以典试事，故用伊为正考官。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，显露心怀怨望，讥刺时事之意。料其居心，浅薄乖张，平日必有纪载。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，悖乱荒唐，怨诽捏造之语甚多。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，大肆訾谤，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，以裁汰冗员为当厄，以钦赐进士为滥举，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，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，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，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，以庶常散馆为畏途。以多选庶常为蔓草，为厄运，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。热河偶然发水，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，其余不计其数，又书雨中飞蝗蔽天。似此一派荒唐之言，皆未有之事。而伊公然造作书写。至其受人嘱托，代人营求之事，不可枚举。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，皆甚属诡秘。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，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、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。今种种实迹见在，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？尔等汉官，读书稽古，历观前代以来，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。况世祖圣祖，重熙累洽，八十余年，深仁厚泽。沦肌浃髓。天下亿万臣民，无不坐享升平之福。我皇考加恩臣下，一视同仁。及朕即位以来，推心置腹，满汉从无异视。盖以人之贤否不一，各处皆有善良，各处皆有奸慝，不可以一人而概众人，亦不可以一事而

概众事。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处之，尔等当仰体朕心，各抒诚悃，交相勉励，殫竭公忠，无负平日立身立德之志。或有一二心术不端者，亦宜清夜自省，痛加俊改。朕今日之谕，盖欲正人心，维风俗，使普天率土，永享升平之福也。尔等承朕训旨，当晓然明白，勿存疑愧避忌之念，但能恪慎供职，屏去习染之私，朕必知之。朕惟以至诚待臣下，臣下有负朕恩者，往往自行败露。盖普天率土，皆受朝廷恩泽，咸当知君臣之大义，一心感戴。若稍萌异志，即为逆天之人，岂能逃于诛戮？报应昭彰，纤豪不爽，诸臣勉之戒之。查嗣庭读书之人，受朕格外擢用之恩。而伊逆天负恩，讥刺咒诅，大干法纪。著将查嗣庭革职拿问，交三法司严审定拟。

甲戌谕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：尔等多出自科甲之人，既诵法圣贤，读书明理，当知君臣之大义，须上下一体，情分相联，方克致升平之治，人人共受其泽。自唐宋以来，去古已远，习俗浇漓，人心诈伪。狂妄无忌惮之徒，往往腹诽朝政，甚至笔之于书，肆其诬谤，如汪景祺、查嗣庭，岂能逃于天遣乎？我国家恩养休息，海宇晏清，八十余年，万民乐业。即尔等父母妻子，孰不沐浴膏泽，安享其福耶？且士人立身行己，以礼义廉耻为重。乃至昏夜乞怜，上书投匭。满纸称功颂德之语，何廉耻荡然至于此极。又有将子弟姻戚门生故旧私书请托者，不知以素所亲爱之人为之请，若先有请托，彼心以为势力可恃，肆其狂妄，无所不为，及实在赃托照拂，实属无益而有损。盖彼无倚恃，尚知警惕自守，勉励供职。款发觉则受请托者不能为之庇护，是非所以爱之，而实以害之也。又尔等皆系各省州县之百姓，受制于有司者。如请托之风尽除，凡地方有司，皆有所畏惧，而廉洁爱民。则尔等之子孙宗族，咸受其庆，不亦善乎？如请托之风不绝，则地方官员各有倚赖，将肆其贪婪，

则尔等之家产，不足饱贪官污吏之溪壑，尔等自为身家桑梓计，亦断应速改历代之陋习也。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，不一而足。其日记所载，狂妄悖逆之语，与汪景祺相为表里。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行政大逆不道之言，不可胜举，实共工驩兜之流也。

○陆生楠之狱

以论前史而获罪者，自陆生楠之狱始。自兹以往，非惟时事不敢论议，即陈古经世之书，亦不敢读矣。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。

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，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陆生楠，细书《通鉴论》七十篇，抗愤不平之语甚多。其论封建之利，言词更属狂悖，显系非议时政。参奏前来，陆生楠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，朕览其履历奏折，前惟颂圣浮词，中间不过腐烂时文，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，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。而倨傲诞妄之气，溢于言词。知其人必非醇谨，及至引见之时，举动乖张。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，陆生楠总默然不能对，但闻朕教训。转多愤懑之色。彼时将伊扣缺，令以主事试用。盖以其人或小有才，令其在京办事学习，以冀浚改也。后伊改授工部主事，引见时，不惟毫无敬畏，且傲慢不恭。显然逆抗，形于词色。夫主事职列部曹，外任知县，历俸多年，或卓异行取，始得升补。而陆生楠以边方举人筮仕之初，即膺兹职，尚何负于伊，而伊竟敢忤及君父乎？伊系广西人，平日必有与李绂、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，故敢如此。是以将伊革职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。一则令其观满州尊君

亲上之心，如此其谨懔。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，如此其整严。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朴之风，如此其诚实。庶冀伊等化去私邪，勉于自新之路。詎意陆生楠素怀逆心，毫无悔悟。怙恶之念愈深，奸慝之情益固。借托古人之事几，诬引古人之言论，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，肆无忌惮，议论横生，至于此极也。前锡保起行之时，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，果能安静守法，自知罪过，则皆可贷其前愆，开予自新。或有私自著作，怨怼罔上者，亦未可定。今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，悖逆之情，尽行败露。其论封建，云“封建之制，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。废之为害，不循其制亦为害。至于今害深祸烈，不可胜言。皆郡县之故”等语。古人之有封建，原非以其制为尽善，而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。洪荒之世，声教未通，各君其国，各子其民。有圣人首出，则天下之众，莫不尊亲。而圣人即各因其世守封之，亦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。盖时势如此，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。夏禹涂山之会，执玉帛者万国。周武王孟津之役，来会者八百侯国。岂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？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，自天子出。”孟子曰：“天下恶乎定？定于一。”孔子、孟子，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，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几矣。至秦始皇统合六国，制天下以郡县，自汉以来，遂为定制。盖三代以前，诸侯分有土地，天子不得而私，故以封建为功。秦汉之后，土地属之天子，一封建便多私心，故以郡县为功。唐柳宗元谓公天下自秦始，宋苏轼谓封建者争之端，皆确有所见而云然也。且中国之郡县，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。历代以来，各蒙古自为雄长，亦互相战争。至元太祖之世，始成一统。历前明二百余年，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，遐迩率服，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。咸凛正朔，以迄于今。是中国之一统，始于秦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，而极盛于我朝。自

古中外一家，幅员极广，未有如我朝者也。至若贾谊、晁错，欲削弱诸侯，乃虑分封之失而欲一之，非以郡县为失而欲分之也。李泌因藩镇之兵连祸结，思以封建为自固之谋，岂尝谓三代之制必可复乎？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。东西南朔，声教所被，莫不尊亲。而陆生楠云：“以郡县之故，至于今害深祸烈，不可胜言。”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？陆生楠能明指之乎？大凡叛逆之人，如吕留良、曾静、陆生楠之流，皆以宜复封建为言。盖此种悖乱之人，自知奸恶倾邪，不容于乡国，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，意谓封建行，则此国不用，可去之他国。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，实天下所不容也。又云“圣人之世，以同寅协工为治。后世天下至大，事繁人多，奸邪不能尽涤，诈伪不能尽烛。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。相既劳而不能深谋，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。始皇一片私心，流毒万世”等语。同寅协工，固为治之要。至于知人任相，惟在人君之明哲。汉唐以来，有贤君图治于上，则必有良将助治于下，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？且同寅协工之道，于封建何与？陆生楠肆意妄言，支离缪戾，至于如此。其言建储也，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，发论云“储贰不宜干预外事，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”等语。书有教胄子之文，礼有文王世子之篇。仪义明备，教戒周详。凡以养成德性，欲其学于古训。深知民情物理之微，周知人间疾苦，稼穡艰难之故，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？至于父子天性，家国一理，惟有至诚至敬，可以为事亲之道，危机之说，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？设使江充掘蛊之时，太子能居易俟命。不诈出武库兵，发长乐卫，则决不至有湖城之难。是戾太子之祸，正由于晓危机也。又陆生楠云“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”等语，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，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。夫建储之事，乃宗庙社稷之业所关，天下苍生万民之命所系也。

倘不加慎重，而所立不得其人，其后不易之而不可，欲易之而不可，以至激为多故者，前代史册，历历可稽。孟子曰：“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。”又曰：“为天下得人难。”言主器之重，必得其人。足以承先启后者，然后可以付之也。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以来，未尝预建储位。而我太宗文皇帝继位丕承，恢宏大烈。世祖章皇帝绍业膺图，抚有中夏。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，御宇绵长。凡我朝圣圣相承，皆未由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。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，锡亿兆臣民之洪庥。逮朕缙登大宝，重熙累洽之盛统。七年以来，中外乂安。是我朝国本至深至厚者，愚人固不能知也。昔宋孝宗时虞允文请早建储贰，孝宗曰：“恐储位既正，人性易骄，即自纵逸，不勤于学，寝有失德，所以未建者，庶几无后悔耳。”孝宗尚知立储之不易，况我圣哲高远之见，十倍于孝宗乎？如陆生楠借汉武帝之事以讥刺者，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。其论制也，则称唐之府兵云：“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，府兵既废，祸乱遂生。至今为梗，上陵下替。”又云“府兵之制，国无养兵之费，臣无专兵之患”等语。唐初府兵之制，本于北周苏绰之仪，其后变为彍骑，乃府兵废弛，不得不出于召募也。德宗之世，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，故欲复府兵之法，然其时亦竟不能复。孔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无事耕种之农，岂能娴于武备？有事征发之扰，岂能兼顾农桑？以此为制，不但弃其兵，并弃其民矣。古者六乡六遂之法，远不可稽。后世民以养兵，兵以卫民，彼此相资。唐宋以来，法制渐详，军农实称两便。安有惜养兵之费，而弃不教之民者乎？本朝设立八旗，京师重地，禁旅云屯，又有巡抚三营，以诘奸禁暴。外省分设驻防将军，以及提镇。内外相维，训谏甚备。无事则分处什伍，兵不扰民。有事则整旅出疆，兵以卫民。此万古之良法。今八十年来，太平无事。

老耄以寿终，幼孤得遂长，孰非兵防卫守之力哉？民间虽有正供以佐军糈，然所出仅百分中之一耳，其得养兵之利也多矣。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，盖其怀蓄逆乱之心，郁不得逞，故以国无养兵之费，以摇动人听，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。所谓执左道以乱政，言伪学非以疑众者，王法之所不宥也。其论隋炀帝，云“后之君臣，倘非天幸，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”等语。隋文帝以勤学节俭为治，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。至隋炀帝以骄奢淫佚，自取败亡，非可诿之于天也。后之人主，不为炀帝之行，岂至有炀帝之祸？又何为而望天幸乎？陆生楠之意又何指也？其论人主，云“人愈尊，权愈重，则身愈危，祸愈烈。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，则我志必疏，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。人虽怒之而不敢泄，欲报之而不敢轻，故其蓄必深，其发必毒”等语，人主身为天子，富有四海。自尧舜禹汤以来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？至于生杀赏罚，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。其生杀赏罚者，皆其人之自取耳。朕临御以来，日理万几，皆奉若天道。因物以付，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。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。试问在廷诸臣，朕自雍正以来，曾以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？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？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，毫无恩怨，又何所庸其畏，何所庸其怒，何所庸其报哉？且云蓄必深，发必毒，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，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？何其那等各案，内外臣工之所共知，无俟朕再为告谕。陆生楠亦身列仕籍，岂无见闻而为此论？其狂悖恶乱，不亦甚乎？又云：“虽怒之而不敢泄，欲报之而不敢轻。”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。虽蓄怒而不敢显言，是以托于论列通鉴。以微泄其愤，又怨而欲报，欲报而不能，但以身为祸烈等语，肆为咒诅。其逆谋发露，公然形于纸笔矣。其论相臣，云“当用首相一人，首相奸谄误国。许凡

欲效忠者，皆得密奏。即或不当，亦不得使相臣知之”等语。夫从来不废密奏者。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，无专令参揭相臣之理。况尊贤之道，最要在于去谗。敬大臣之道，在于官盛任使。君臣一德一心，乃为元首股肱之义。是以择相之道，惟在得人。若既得其人，而又使人密奏。且奏或不当，而犹多方掩饰。是窥伺挟诈，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。且臣相果属儉邪，便当露章宣奏，而群小故为排沮。或欲动摇大臣，或从门户起见，人主自宜分别是非，以定邪正，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？又云“因言固可知人，斩听亦有失人。听言不厌其广，广则庶几无壅。择言不厌其审，审则庶几无误”等语。舜命禹曰：“无稽之言勿听，勿询之谋勿庸。”召公奭告武王曰：“言以道接。”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，揆之以情，未尝拒人之言，亦未尝轻听人言，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，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？又云“为君为臣，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，不徒在政迹，然亦不可无术相防”等语。君臣之间，岂容丝毫权术乎？三载考绩，必以政事为据。若不以政迹，人亦何由而知耶？其论王安石，云“贤才尽屏，咨谋尽废，而已不以为非，人君亦不知人之非，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”等语。圣人廓然大公，物来顺应，有何作用乎？宋神宗锐意求治，而安石任意更张，其失在于作用明矣。又云“笃恭而天下平之言，彼固未之见；知天知人之言，彼似未之闻也。人无圣学能文章，不安平庸，鲜不为安石者”等语。安石之误国，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。非谓知天知人，惟有端居深拱，静默无为。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，而遂可使天下平也。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，正由敬信劝威之道，而极言其效如此。非百务尽隳，上下睽绝而后可为治也。其文词议论，险怪背谬，无理之甚。又其论无为之治，云“虽有忧勤，不离身心。虽有国事，亦第存乎纳领。不人人而察，但察铨选之任。

不事事而理，止理付元之人。察言动，谨几微，防谗间，虑疏虞，忧盛危明，防微杜渐而已。至若笏豆之事，则有司存”等语。从古圣帝明王之道，未有不以勤劳自励，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。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。理财一事，自应付之臣下。至用人之权，不可旁落。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，大臣敢膺此任乎？无论稍存容私徇情之见者，固不可一日当此重任，即秉公持正之人，于同舍黜陟之际，不为怨府，即为祸源矣。至若懋昭令德，克勤小物，不泄迩，不忘远，古训昭然。汉宣帝综核名实，治理一新。光武务勤吏治。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，朝夕省览。古来贤主，未有不本于勤劳者，岂可以用人大节，为笏豆之事，置之不问也？又云“绛度教谏，异辄顺从，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。盖有圣功，即有王道，使徒明而不学，则人欲盛而天理微。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。至力衰而志隳，未有能如其初”等语。夫嘉谋嘉猷，入告于尔后，乃朕日所望于大小臣工者。即位以来，时时谕令诸臣，以忠言谏论，面折廷诤。凡内外诸臣条陈政务，有当理而可行者，必令廷臣详议施行，并未尝拒谏诤而喜顺从也，至于人臣朋比，历代有之。有以阿谀谄附为朋比，亦有似倾险幸直为朋比，如汉之梁冀，唐之牛李，宋之绍述，明之门户是也。若唐虞之世，盈廷师济，一德一心，谓之朋比可乎？以上皆陆生楠论断通鉴中语，朕指出数条如此。陆生楠生当盛世，服习诗书，身叨乙榜，赴选朝官。非若曾静之僻处深山旷野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冥顽不灵之人也。且观其人，未尝不小有才。谓宜感恩戴德，勉恩报效，而乃怀不逞之邪心。于进身筮仕之时，肆无稽之横议；于政教修明之日，对越大廷，则暴戾恣睢之气，形于词色；远逐边塞，则猖狂怪诞之说，任意发舒。其意专以摇惑众心，扰乱政纪为务。朕实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，愤懑何自而积。此真逆性由于

夙成，狡恶因之纷起。诚不知天命而小畏，小人中之尤无忌惮者也。陆生楠罪大恶极，情无可逭。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，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。著九卿翰詹科道，秉公定拟具奏。

○曾静、吕留良之狱

曾、吕之狱，本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巨案也。世宗至将其始末自著一书，名曰《大义觉迷录》，颁之学官，使秀才人人同读，与卧碑圣谕、广训等同视。后至乾隆间，而《大义觉迷录》始为禁书。雍正间之颁之学官，世宗之深心也。乾隆间之列为禁书，又高宗之深心也。各从其时，要之皆专制国之雄主矣。今采《大义觉迷录》中上谕汇列之，共省览焉。事之缘起，皆仍原文，不加褒贬，读者当能得之于言外也。

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静，因考试劣等，家居愤郁，忽图叛逆。遣其徒张熙，诡名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，劝以同谋举事。岳钟琪拘留刑讯，究问指使之人，张熙甘死不吐。岳钟琪置之密室，许以迎聘伊师，佯与设誓，张熙始将曾静供出。岳钟琪具奏，并其逆书奏闻。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禄、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至湖南，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捉曾静审讯。据曾静供称生长山僻，素无师友，因应试州城，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，有妄论夷夏之防，及井田封建等语，遂被蛊惑，随遣张熙至浙江，吕留良家访求书籍。吕留良子吕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诗文，内皆愤懑激烈之词。益加倾信，又往访吕留良之徒严鸿逵。与鸿逵之徒沈在宽等，往来投契，因致沈溺其说，妄生异心等语。随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，旋命浙江总督李卫，搜查吕留良、严鸿

達、沈在宽家藏书籍。所获日记等逆书，并案内人犯，一并拿解赴部。命内阁九卿等，先将曾静反复研讯，并发看吕留良日记等书。据曾静供称，前因轻信吕留良邪说，被其蛊惑，兼闻道路浮言，愈生疑罔，致犯弥天重罪。今蒙一一讯问，并发吕留良日记等书，极其狂悖。又知圣朝深恩厚泽，皇上大孝至仁，心悦诚服。自悔从前执迷不悟，万死莫赎，今乃如梦初觉等语。因俯首认罪，甘服上刑，内阁九卿等备录供词，进呈御览。

雍正七年四月乙丑，谕内阁九卿等：我朝肇造区夏，天锡人归，列圣相承，中外从义，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，福庇兆民，文治武功，恩思德教，超教百王。普天率土，心悦诚服。虽深山穷谷，庸夫孺子，以及凡有血气之伦，莫不尊亲。詎意逆贼吕留良者，悍戾凶顽，乱好乐祸，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，追思旧国，愤懣诋讥。夫仪宾之后裔，于亲属至为疏贱，何足比数。且生于明之末季，当流寇陷北京时，吕留良年方孩童。本朝定鼎之后，伊亲被教泽，始获读书成立，于顺治年间应试，得为诸生。嗣经岁科屡试，以其浮薄之才，每居高等，盗贼虚名，夸荣乡里。是吕留良于明毫之痛痒之关，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？乃于康熙六年，因考试劣等，愤弃青衿，忽追思明代，深怨本朝。后以博学鸿词荐，则诡云必死，以山林隐逸荐，则剃发为僧。按其岁月。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，乃始幡然易虑，忽号为明之遗民，千古悖逆反覆之人，有如是之怪诞无耻，可嗤可鄙者乎？自是著邪书，立逆说，丧心病狂，肆无忌惮，其实不过卖文鬻书，营求声利。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，凭虚撰造，公然骂詈。所著书文以及日记等类，或镌板流传，或珍藏秘密，皆人世耳目所未经。意想所未到者，朕翻阅之余，不胜惶骇。盖其悖逆狂噬之词。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，不忍出之于口，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。夫普天之

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子孙者数十年，乃不知大一统之义。其日记所载，称我朝或曰清，或曰北，或曰燕，或曰彼中。至致逆藩吴三桂，书亦曰清。曰往讲。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，何其悖乱之甚乎？且吴三桂、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，则欣然有喜，惟恐其不成。于本朝疆宇之恢复，则怅然若失，转形于嗟叹。于忠臣殉难，则污以过失，且闻其死而快意。不顾纲常之倒置，惟以助虐迎冠为心；不顾生民之涂炭，惟以祸结兵连为幸。何吕留良处心积虑，残忍凶暴至此极也？又如伪永历朱由榔窃立于流寇之中，在云贵广西等处，其众自相攻劫，贻祸民生。后兵败逃窜缅甸。顺治十八年。定西将军爱星阿等，领兵追至緬城。先遣人传谕緬酋，令执送朱由榔。大军随至城下，緬人震惧，遂执朱由榔献军前。此伪永历之实迹。岂有被执时满汉官兵，转于伊马前皆跪之事。譬说荒唐，诞谬极矣。总之逆贼吕留良，于本朝实有征应之事迹。则概为隐匿而不书，而专以造作妖诬。快其私愤，又文集内云“今日之穷，为羲皇以来所仅见”等语。夫明末之时，朝廷失政，贪虐公行，横征暴敛，民不卿生。至于流寇肆毒，疆场日蹙，每岁饷千百万，悉皆出于民力，乃斯民极穷之时也。我朝扫清寇气，与民休养，于是明代之穷民，咸有更生之庆。逮我圣祖仁皇帝爱育黎元，海内殷庶，黄童白叟，不见兵革，蠲租减赋之政，史不胜书，久道化成，休养生息，六十余年，民安物阜。即考羲皇以来，史册所纪，屈指而数，蒙上天之眷佑，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，不可多得，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乎？又日记所载怪风震雷，细星如慧，日光磨荡，皆毫无影响。妄捏怪诞之处甚多。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，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，其失实不经，皆不顾也。夫灾异亦古所时有，上

天垂象，原以儆戒人君，令其修省进德。若以捉影捕风之语，指为灾异，传诸后世，或谓从前太平盛世，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，傥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，必生轻忽，漫不经心。凡所以启后人君之怠玩者，其罪可胜言乎？其他猖狂悖乱之词，令人痛心疾首者，不可枚举。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，读书学问，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。且曾静止讥及于朕躬，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。曾静之谤讟由于误听流言，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。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，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。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，人怀不逞。如汪景祺、查嗣庭之流，皆以谤讟悖逆，自伏其罪，皆吕留良之遗害也。甚至民间氓庶，亦喜造言生事。如雍正四年，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。比时惊疑相煽。逃避流离者有之。此皆吕留良一人之为倡道于前，是以举乡从风而靡。甚至地方官吏，怵其声势之器陵，党徒之众胜，皆须加意周旋。优礼矜式，以沽重儒之誉。如近日总督李卫，为大臣中刚正之人，亦于到任之时，循沿往例，赠送祠堂匾额，况他人乎？此其陷溺人心，浊乱世俗，害有不可胜言者。数年以来，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，可忧者甚大，早夜筹画，仁育义正，备极化导之苦心，近始渐为转移，日归于正。若使少为悠忽，不亟加整顿，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，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。而天经地义之大闲，泯没沦弃，几使人人无父无君之人矣。今日天道昭然，恶贯时至，令其奸诈阴险，尽情败露，则不容不明正其罪，以维持世教，彰明国法。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，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。夫周程张朱，世之大儒，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，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？此其狎侮圣儒之教，败坏士人之心，真名教中之罪魁也。朕即位以来，实不知吕留良有著述之事。而其恶贯满盈，神人共愤，天地不容，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

琪之举。曲折发露，以著吕留良之凶顽。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，曾应举成名。蒙恩拔置鼎甲，仕列清华，其余子孙多游庠序。乃不即毁板焚书，以灭其迹。且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，党羽连及吕葆中，其时逆迹，早以彰著。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，免其究问，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。就常情而论，吕葆中之兄弟子孙，遇如此之惊危险祸，且荷蒙圣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，尤当感激悔悟，共思掩覆前非，以为幸逃诛殛之计。岂料冥顽悍惊，习与性成，仍复保守遗编，深藏笥篋，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。故世恶相承，罔知儆惕。而实乃天道昭然，不容少昧，使逆贼之阴谋，彻底呈见于今日，逆贼之遗毒，不致漏网于天诛也。曾静逆书，朕已洞悉。知外间逆党颇众，竟有散布讹言，希图构乱者。然其所诋惟朕之一身，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，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，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，至深至重。即凡天下庸夫孺子，少有一线之良，亦无不切齿而竖发，不欲与之戴覆天地。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应得。已故逆贼吕留良及见在子孙嫡亲兄弟子侄照何定例治罪之处，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，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，各抒己见，详核定议具奏。

六月乙亥谕：朕前之所批岳钟琪奏折，偶检几件，发与曾静看。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，一德一心，在岳钟琪之忠诚报国，公正无私，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。而朕以至诚御下，恩眷大臣，亦极倚任之优崇。询为上下交孚，明良盛事。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，此不过数十分中之一分。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，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。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，岂非醉生梦死，冥顽无知之人乎？此乃天道不容，令其自行败露也。查曾静逆书，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，俱不允行。岳钟琪深自危疑，因而上书等语。曾静平昔夷狄之见，横介于胸中，又

闻此无根之语，不觉其逆心之愈炽，遂为此孟浪之举。但此传闻之说，必有所自来，若曾静确实供出，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，今尚蒙朕之宽宥，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，亦必从宽贷，况传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。若由曾静供出之人，转究造言之缘起，则此事可得归结。著杭奕禄、海兰详悉宣示曾静，钦此。

丙戌谕内阁：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，肆为诬为谤，极尽悖逆，乃其逆徒严鸿逵者，实为吕留良之羽翼。推尊诵法，备述遗言，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。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。夫吕留良以本朝诸生，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，无端反噬，愤懑猖狂，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罕见，至若严鸿逵，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，践土食毛，戴高履厚，严鸿逵之于明代，岂有故君旧国之恩？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，何所庸其感愤，何所庸其追忆，而亦敢效颦乎？兹择其悖逆之语。一并宣示。日记有云：“索伦地方，正月初三日，地裂，横五里，纵三里。初飞起石块，后出火。近三十里内，居人悉迁避。”又云：“热河水大发，淹死满州人二万余。”又云：“十六夜月食，其时见众星摇动，如欲坠状。又或飞或走，群向东行。”又云：“旧年七月初四日，星变。钦于监云：‘此星出天沛垣，入天市垣，分野属吴越。有兵起于市井之中。’”凡此荒唐叛逆之语，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月内所记载者，不胜枚举。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，实有之事。盖彼地气脉使然，前次已经屡见，其旁远近山顶，亦有烈焰者，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？至热河发水一事，因此地山回峦抱中，惟一道河流，每雨水稍大，众水所汇，或致冲决堤岸。康熙四十八年六月，大雨连昼夜。其时附近行宫一带，地处高阜，惟隔岸山根之水，为水所漫溢。本地久居之民及扈从之官兵，皆知雨止水即减退，安重不迁，惟寄居之匠人等惊惶迷惑。或有愚人编木为筏，谓可乘

流而渡，遂有木筏触石而解，沉溺者数人，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，随从官员二三百人驻紮，即在水发之地。因约束严整，无一妄动之人，及至水退，皆安然无恙，无一人被水者。乃严鸿逵谓淹死满洲二万余，何妄诞至于斯极！且热河之地，五方之人毕集，乃严鸿逵谓独淹死满洲，有此理乎？严鸿逵生今之世，为今之民，明代沦亡已久，而我朝定鼎，业经百年有余。乃臆造讹言，好乱乐祸，于升平宁谧之时，作干戈扰攘之望。以圣祖之德盛化神，而公然诬蔑。以今日之民安物阜，而朝夕咒诅，种种丧心病狂，皆拾吕留良之唾余，而尤加幻妄，岂非凶逆性成，万死有余之逆贼乎？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，浮薄之士，簧鼓其虚誉，致有廷臣以纂修《明史》荐举及伊者。伊乃自鸣得意，抗慢诡激。其自记有云：“予自意定，当以死拒之耳。”其大言藐抗若此。又云：“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，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，在彼中讲学。学者称蒲潭先生。从前因读讲义，始弃诸生。”夫以朕特旨，诏修《明史》，旁求山林隐逸之士，而廷臣荐举及伊，至欲以死力拒，竟视朝廷如儿戏，等征召于弁髦。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，尺书驰间，一介相通，同数千里之外，呼吸相应。招纳党类，天地间显图不轨，扰乱纲常，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。似此悖逆叛乱之人，煽惑民心，且获罪于圣祖皇考，与吕留良党恶共济，其罪不容于死，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，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。

戊子谕内阁，我朝建极绥猷，遐迩率育。海隅日出，莫不尊亲，乃逆贼吕留良、严鸿逵凶悖恶乱，无父无君，著书显为谤讟，于本朝之大统，肆为诋斥之词；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，伟烈丰功，任意为诬蔑慢诅之语。其猖狂妄幻，肆无顾忌，人人痛心疾首，不共戴天。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，宣示中外诸臣，公议治罪。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，生于

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，自其祖父，已在覆帔化育之中，非止身被德教者可比。纲常伦理之大义，尤当知慎。乃堕惑逆党之邪说，习染凶徒之余风，亦怀不逞，附会诋讥，慕效梗化之民，称本朝为清时，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，狂悖已极。此沈在宽与吕留良、严鸿逵，党同叛逆之彰明较著者也。至其所著诗集有云：“更无地著避秦人。”又云：“陆沈不必由洪水，谁为神州理旧疆？”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，化理郅隆，目为神州陆沈，有同洪水之患，其谬戾尤为狂肆。且即以洪水言之，明代二百余年。黄运两河，时时溃决，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。我圣祖仁皇帝，时廑忧勤，详示方略，躬亲相度，至于再三。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，疏浚导制之宜，悉经睿虑精详，尽美尽善。以致川流循轨，黄水安澜。数十年来，堤工巩固，亿姓永无昏垫之虞，共享平成之庆。迨朕绍膺丕绪，恪遵谟烈，加意修防。仰荷上天眷佑，七年以来，河流咸归故道，海口深通，清淮迅畅。三省运道，遄行无阻，至于北直畿辅之地，南省浙江等处，凡有海塘河渠，以及应行经理之处，皆渐次兴修，蓄泄以时，旱潦有备，府事修和，桑麻遍野。此时之神州，何处可指为陆沈，又何地方可指为洪水乎？且沈在宽云“谁为神州理旧疆？”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？沈在宽年未四十，而亦效其师之狂悖，肆诋本朝，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，千里论交，一见如故。赋诗赠答，意同水乳。此其处心积虑，以叛逆为事，其罪实无可逭。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。

九月癸未以曾静等口供及历次所降谕旨刊刻《大义觉迷录》颁行天下，上谕诸王文武大臣等：自古帝王之有天下，莫不由怀保万民，恩加四海。膺上天之眷命，协亿兆之欢心，用能统一寰区，垂庥奕世。盖生民之道，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。此天下一家，万物一体。自古迄今，万世不易之常经，非寻常之

类聚群分。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，所可妄为同异者也？书曰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”盖德足以君天下，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。未闻不以德为感孚，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理。又曰：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”此民心向背之至情。未闻亿兆之归心，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。又曰：“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”惟有德者乃能顺天，天之所与，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？我国家肇基东土，列圣相承，信义万邦，天心笃祐，德教宏敷，恩思遐畅，登斯民于衽席，偏中外而尊亲者，百年于兹矣。夫我朝既仰承天命，为中外生民之主，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。何得以华夷而殊视？而中外臣民，既共奉我朝以为君，则所以归诚效顺，尽臣民之道者，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。此揆之天道，验之人理，海隅日出之乡，普天率土之众，莫不知大一统之所在。悉子悉臣，罔敢越志者也。乃逆贼吕留良，凶顽悖恶，好乱乐祸，亾叔扰彝伦，私为著述。妄谓德佑以后，天地大变，亘古未经，于今复见。而逆徒严鸿逵等，转相附和，备极猖狂，余波及于曾静，幻怪相煽，恣为毁谤。至谓八十余年以来，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在逆贼等之意，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，入为中国之主，妄生此疆彼界之私，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。不知本朝之为满洲，犹中国之有籍贯。舜为东夷之人，文王为西夷之人，曾何损于圣德乎？诗言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”者，以其潜王猾夏，不知君臣之大义。故声其罪而惩艾之，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。若以戎狄而言，则孔子周游，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，而秦穆之霸西戎，孔子删定之时，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。盖从来华夷之说，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，彼此地丑德齐，莫能相尚。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，南人指北为索虏。在当日之人，不务修德行仁，而徒事口舌相讥，已为至卑至陋之见。今逆贼等于一统华夷一家之时，而妄

判中外，谬生忿戾，岂非逆天悖理，无父无君，蜂蚁不若之异类乎？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。明代自嘉靖以后，君臣失德，盗贼四起，生民涂炭，疆域靡宁。其时之天地，可不谓之闭塞乎？本朝定鼎以来，扫除群寇，寰宇乂安，政教兴修，文明日盛，万民乐业，中外恬熙，黄童白叟，一生不见兵革。今日之天地清宁，万姓沾恩，超越明代者，三尺之童，亦皆洞晓，而尚可谓之昏暗乎？夫天地以仁爱为心，以覆载无私为量，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，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。孔子曰：“故大德者必受命。”自有帝王以来，其揆一也。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，不伦天心之取舍、政治之得失，不论民物之安危、疆域之大小，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，区区地界为忿嫉，公然指斥，以遂其昧弃彝伦、灭废人纪之逆意。至于极尽狂吠之首，竟敢指天地为昏暗。岂皇皇上天，鉴观有赫，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，幅员不能广远。其中有不向化者，则斥之为夷狄。如三代以上之有苗、荆楚、玁狁，即今湖南、湖北、山西之地也，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？至于汉、唐、宋全盛之时，北狄西戎，世为边患，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，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。自我朝入主中土，君临天下，并蒙古极边诸部落，俱归版图，是中国之疆土，开拓广远，乃中国臣民之大幸，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？从来为君上之道，当视民如赤子。为臣下之道，当奉君如父母。如为子之人，其父母即待以不慈，尚不可以疾怨忤逆，况我朝之为君，实尽父母斯民之道，殚诚求保赤之心，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，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？从前康熙年间，各处奸徒窃发，动辄以朱之太子为名，如一念和尚、朱一贵者，指不胜屈。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、假称朱姓，托于明之后裔，遇星士推算，有帝王之命。以此希冀，鼓惑愚民，见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。从

来异姓先后继统，前朝之宗姓，臣服于后代者甚多。否则隐匿姓名，伏处草野，从未有如本朝奸民，假称朱姓，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。似此蔓延不息，则中国人君之子孙，遇继统之君，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，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？况明继元而有天下，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。以纲常伦纪之，岂能逃窜窃之罪？至于我朝之于明，则邻国耳。且明之天下，丧于流贼之手。是时边患四起，倭寇骚动，流贼之有名目者，不可胜数。而各村邑无赖之徒，乘机劫杀。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，又借征剿之名，肆行扰害，杀戮良民请功，以充获贼之数，中国民人，死亡过半。即如四川之人，竟致靡有子遗之叹，其偶有存者，则肢体不全，耳鼻残缺，此天下人所共知。康熙四五十年间，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，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，削平群寇，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，而登之衽席之上。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，大矣，至矣。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，史不胜数。其藩王之后，实系明之子孙，则格外加恩，封以侯爵。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。而胸怀叛逆之奸民，动则假称朱姓，以为构逆之媒，而吕留良辈，又借明代为言，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，冀遂其叛逆之志。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，实明代之仇讎也。且如中国之人，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，其害不过妄意诋讥，蛊惑一二匪类而已，原无损于是非之公，伦常之大。傥若外国之君，入承大统，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，则中国之人，其何所托命乎？况抚之则后，虐之则仇，人情也。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，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。假使为君者，以非人情之事，加之于下，为下者其能堪乎？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，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？孔子曰：“君子居是邦也，不非其大夫，况其君乎？”又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，其大夫犹不可非。况我朝奉天

承运，大一统太平盛世，而君上尚可谤议乎？且圣人之在诸夏，犹谓夷狄为有君。况为我朝之人，亲被教泽，食德服畴，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？韩愈有言：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，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。历代以来，如有元之混一区宇，有国百年，幅员极广。其政治规模，颇多美德，而后世称述者寥寥。其时之名臣学士，著作颂扬，纪当时之休美者，载在史册，亦复灿然具备。而后人则故为贬词，概谓无人物之可纪，无事功之足录。此特怀挟私心，识见卑鄙之人，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，欲贬抑淹没之耳。不知文章著作之事，所以信今传后。著劝戒于简编，当平心执正而论。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，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，细大不遗。庶俾中国之君见之，以为外国之主，且明哲仁爱如此，自必生奋励之心。而外国之君，见是非之不爽，信直道之常存，亦必愈勇愈为善，而深戒为恶。此文艺之公，有补于治道者，当何如也。倘故为贬抑淹没，略其善而不传，诬其恶而妄载，将使中国之君，以为既生中国，自享令名，不必修德行仁，以臻郅隆之治。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，以为纵能夙夜励精，勤求治理，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。而为善之心，因而自怠。则内地苍生，其苦无有底止矣。其为人心世道之害，可胜言哉？况若逆贼吕留良等，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，大经大法，概为置而不言。而更凿空妄撰，凭虚横议，以无影无响之谈，为惑世诬民之具，颠倒是非，紊乱黑白，以有为无，以无为有。此其诞幻讎寿张，诋人听闻，诚乃千古之罪人。所谓民不畏死，凡民罔不孥，不待教而诛者也，非止获罪于我国家而已。此等憸邪之人，胸怀思乱之心，妄冀侥幸于万一，曾未通观古今大势。凡首先倡乱之人，无不身膏斧钁质，遗臭万年。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，岂乌合鼠窜之辈，所能轻言动摇？即当世运式微之时，其首乱之人，历观史册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

者。如秦末之陈涉、项梁、张耳、陈余等，以至元末之刘福通、韩林儿、陈友谅、张士诚等，虽一时跳梁，究竟旋为灰烬。而唐宋中叶之时，其草窃之辈，接踵迭迹，亦同归于尽。总之此等奸民，不知君臣之大义，不识天命之眷怀，徒自取诛戮，为万古之罪人而已。夫人之所以为人而異于禽兽者，以有此伦常之理也。故五伦谓之人伦，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。君臣居五伦之首，天下有无君之人，而尚可谓之人乎？而怀无君之心，而尚不谓之禽兽乎？尽人伦则谓人，灭天理则谓禽兽，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。且天命之以为君，而乃怀逆天之意，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？朕思秉彝好德，人心所同。天下亿万臣民，共具天良，自切尊君上之念，无庸再为剖示宣谕。但儉邪昏乱之小人，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，普天之下，不可言止此数贼也。因颁此旨，特加训谕。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，当问天扪心，各发天良，详细自思之。朕之详悉剖示者，非好辩也。古昔人心醇朴，是以尧舜之时。都兪吁咈，其词甚简。逮至殷周之世，人心渐不如前，故殷盘周诰。所以诰诫臣民者，往复周详，肫诚剴切，始能去其锢蔽，觉其愚蒙，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。每见阴险小人，为大义所折，理屈词穷，则借圣人之言，以巧为诋毁曰：“是故恶夫佞。”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，因子路“何必读书然后为学”之语而发。盖以无理之论，而欲强胜于人，则谓之佞，所谓御人以口给也。若遇吕留良、严鸿逵、曾静等逆，背理惑世诬民之贼，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，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，豁然醒悟，不至遭天谴而罹国法。此乃为世道人心计，岂可以谓之佞乎？天下后世，自有公论。著将吕留良、严鸿逵、曾静等悖逆之言，及朕谕旨，一一刊刻通行，颁布天下，各府州县，远乡僻壤，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。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，使将来后学新进

之士，人人观览知悉。倘有未见此书，未闻朕旨者，经朕随时察出，定将该省学政，及该县教官，从重治罪。特谕。

丁未怡亲王大学士、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，讯问曾静、张熙，照大逆不道律，即行正法。上御乾清宫召入诸臣等，并令李绂随入，谕曰：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、张熙，伊等大逆不道，实从古史册所未有。以情罪论之，万无可赦。但朕之不行诛戮者，实有隐衷。上年曾静之徒张熙，诡名投书与岳钟琪。岳钟琪仓卒之间，忿怒惊惶，不及筹算，即邀巡抚西琳，臬司硕色，坐于密室，将张熙严加根究，问其指使之人，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。旋即加以刑讯，而张熙甘死不吐，岳钟琪无可如何。越二三日，百计曲诱，许以同谋，迎聘伊师。与之盟神设誓，张熙始将姓名一一供出。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，朕披览之下，为之动容。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，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，则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。朕洞鉴岳钟琪之心，若不视为一体，实所不忍。况曾静等僻处乡村，为流言所惑，其捏造谤言之人，实系阿其那、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。因犯罪发遣广西，心怀怨忿，造作恶语，一路流传。今已得其确据，若非因曾静之事，则谣言流布，朕何由闻知，为之明白剖晰，俾家喻而户晓耶？且从来国家之法，原以有惩一儆百。曾静等之悖逆，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，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，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。所以宽宥其罪，并非博宽大名而废法也。一切朕另有谕旨。

戊申谕：自古凶顽之徒，心怀悖逆，语涉诋诬者，史册所载，不可枚举。然如今日曾静，此事之怪诞离奇，讵寿张为幻，实从古所未见，为人心之所共忿，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。然朕往复思之，若伊讪谤之语。有一事之实。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，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，即天下臣民，亦应共怀离异

之志。若所言字字皆虚，与朕躬毫无干涉，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，偶闻犬吠鸱鸣而已，又安得谓之讪谤乎？上年此事初发之时，朕即坦然于怀，实无丝毫忿怒之意，笑而览之，此左右大臣皆深知者。嗣令侍郎杭奕禄、副都统海兰，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，明白晓谕，逐事开导，动以天良，祛其迷惑。而伊始豁然醒悟，悔过感恩，其亲笔口供，不下数万言，皆本于良心之发见，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，遂妄萌悖逆之念，甘蹈赤族之诛也。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，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。而其谤及朕躬者，则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祿我、允祿题等之逆党奸徒，造作蜚语，布散传播，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。自上年至今，已将一载，朕留心体察，并令内外大臣，各处根究。今此案内，著初书造谤言之首恶，俱已败露，确有证据，并不始于曾静者，尽明白矣，与朕初意毫无差谬。则曾静之误听，尚有可原之情。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。阿其那等，蓄心阴险，存倾陷国家之念，怀与皇考为仇之心，而一一加之于朕。总因阿其那等，平日之逆谋不遂，蓄养匪类者久矣。播散讹言，分门立户，各各收买党羽，欲以鼓惑人之耳目。俾素蓄逆念之人，蠢动而起，然后快心，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。夫加朕以凶暴恶名，其罪犹轻，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，而作如此归结，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？阿其那、塞思黑等之罪，实万世不足以赎矣。伊等之奸谋若此，自今败露者即不胜数。其他匪类，邪党之听其驱使者，奚止数千百人，造作种种诬谤之语，已流散于极边远塞。则宇宙之内，乡曲愚人，为其所惑者，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？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，身在地方，有稽查之责，乃伊将所见所闻，俱行隐瞒，不以入告。朕在九重内，则由而知之？何从而究之？又何自而剖晰开示，使天下臣民共晓之？今蒙上天皇考，俯垂默佑，令明神驱使曾静，

自行投首总督岳钟琪之前，俾造书造谤之奸人，一呈露，朕方得知，若辈残忍之情形，明目张胆，将平日之居心行事，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，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，亦可知阿其那、寒思黑等蓄心之惨毒。不忠不孝，为天祖之所不容，国法之所难宥，俾天下后世，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。此朕不幸中之大幸，非人力之所能为者。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，即此可以宽其诛矣。从来奸究凶丑，造作妖言，欲以诬民惑众者，无时无之。即如从前妖言云：“帝出三江口，嘉湖作战场。”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。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，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，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，悉行诛戮。又如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，系前明后裔。遇星士推算，伊有帝王之命。似此诞幻荒唐，有关世道人心之语，往往地方大臣官员，希图省事，目为疯颠。苟且掩护于一时，而未念及迷惑之害。日月渐远，传播渐多，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，转令无辜之人，受其牵累。此皆庸碌无能，视国家利害如膜外之大臣等，养痍之害也。又如村塾训蒙之人，本无知识，而又困穷无聊，心怀抑郁，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，授于村童传唱。而不知者，遂误认为童谣，转相流布。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，紊乱国法者。地方大吏有司，视为泛常，不加稽察惩创，以防其渐可乎？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，欲以摇惑旗人之心。舒楞额闻之，据实入奏。此时降旨根究，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。凡属流言初起之时，若地方大臣，即肯悉心穷究，必能得其根由，使奸究不至漏网，庸愚无知，亦不至拖累。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，良非浅鲜。今因曾静之事，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。盖以此案发觉甚早，易于追寻，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。且朕之宽宥曾静，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。虞书曰：“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。”曾静之过虽大，实有可原之

情，昔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：“凡人孰能无过，若过而能改，即自新迁善之机，故人以改过为贵。但实能改过者，无论所犯之大小，皆不当罪之也。”朕只承圣训，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。盖过大而能改，胜于过小而不改者。若曾静可谓改过者矣。朕赦曾静，正欲使天下臣民，知朕于改过之人，无不可赦之罪，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。且朕治天下，不以私喜而赏一人，不以私怒而罚一人。曾静狂悖之言，止于谤及朕躬，并无反叛之实事，亦无同谋之众党。彼跳梁逆命之人，果能束身归命，畏罪投诚，尚且邀赦宥之典，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？且曾静之前后各供，俱系伊亲笔书写，并非有所勉强逼勒，亦并非有人隐授意指，实由于天良感动，是以悛悔之心，迫切诚恳，形于纸笔。此乃其可原之情，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，而欲宽其罪也。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，而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。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，较之从前诬谤之语，其轻重悬殊，何止什佰。论其情罪，岂足相抵？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，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鸱鸣无以异矣。然朕亦不论。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，另行申明正法外，著将曾静、张熙免罪释放，并将伊之逆书，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，与伊口供，一一刊刻颁布，使天下之人共知之。楚省地方，大小官员等，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，敷扬朕训，化诲百姓，尽去邪心。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，实有忝于父母斯民之责，此则深当愧耻者。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，或将曾静、张熙，有暗中贼害情形，朕必问以抵偿之罪。曾静等系特旨赦宥之人，彼本地之人，若以其貽羞桑梓，有嫉恶暗伤者，其治罪亦然。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，而追究诛戮之。盖曾静之事，不与吕留良等。吕留良之罪，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，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。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，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

矣。特谕。

己酉怡亲王等奏：伏读上谕宽宥曾静，仰见我皇上大度包涵，如天之无不复，如地之无不载。虽恶兽毒蛇，魑魅魍魉，不忍以雷霆歼灭，欲使之革面回心。自尧舜禹汤以至于今，未闻此宽大之典也。伏思我朝创业垂统，列祖圣圣相承。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，丰功骏烈，炳耀日星，厚泽深仁，浹洽宇宙。皇上嗣统建极，大孝大德，至圣至诚。宵旰勤民，仁育义正，躬行节俭，俾藏富闾阎，广沛恩膏。以普宁黎庶，蠲赈动盈亿万，教养溥遍遐荒。数年以来，年岁丰登，民气和乐，嘉祥骈集，风俗阜成。举凡含齿戴发之俦，靡不沐浴皇风，歌咏帝德。山陬海澨，僻壤穷乡，咸顺则怀恩，心悦诚服。乃有曾静者，性与人殊，凶狡狂幻。蛊惑于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悖论，复道听阿其那、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匪类，散布诬捏，毫无影响之流言。辄敢编集蜚语，缮写谤书。令其徒张熙，从湖南远至陕西，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。虽不能为反叛之事，实素蓄反叛之心，是以恶贯满盈。神明驱遣，令其自行败露，身服典刑，以消异类之邪说，以正天下之人心也。经年以来，中外臣民，闻其噪吠，皆切不共戴天之忿，思食其肉而寝其皮。今皇上沛如天之仁，悯其始由的，今已悔悟，情有可原，特加宽宥。伏读圣谕，以改过望天下之人，过大而能改，胜于过小而不改。若实能改过，则无不可赦之罪。又念跳梁逆命者，畏罪投诚，尚邀从宽之典。大哉皇言，宽仁好生之德，度越千古。但曾静梟獍性成，阴谋不轨，诬谤悖逆，罪恶弥天。查律例开载十恶，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，皆当赦之所不原。是曾静之罪在十恶，乃三宥之所不及。而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，赴陕投递逆书，思欲构乱，亦所难宽。仰祈皇上敕下法司，即将曾静、张熙，按律处决，碎尸悬首。查其亲属逆党，尽与歼除。以明朝廷之宪

章，慰臣民之共愤。得旨：宽宥曾静等一案，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辞者。天下后世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皆朕身任之，于臣工无与也。但朕亦再四详慎，所降谕旨，俱已明晰。诸王大臣官员等，不必再奏。各省督抚提镇，有因朕宽宥曾静等复行奏请者，著通政司将本发还。

雍正八年十二月，刑部等衙门会议，吕留良身列本朝子衿，妄附前代仪宾之裔，追思旧国，诋毁朝章，造作恶言，妄行记撰，猖狂悖乱，罪恶滔天。甚至敢将圣祖仁皇帝诬蔑指斥，悖逆已极。臣等莫不切齿痛心，允宜按律治罪，显加诛灭，以扶人纪，以绝乱源。吕留良应剖尸梟示，财产入官，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，世恶相济，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，逆迹彰著，亦应剖尸梟示。吕毅中应拟斩立决，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、妻、妾、姊、妹之子、妻、妾，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，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，已经刊刷及钞录者，于文到日，出示遍谕，勒限一年，尽行焚毁。得旨：吕留良怀悖逆不臣之心，假托先儒糟粕余论，欺世盗名，以致人心陷溺，为其迷惑已久。愚昧之徒，称为夫子，几谓其驾乎程朱之上，甚至奉祀书院以尊崇之。今其逆谋秽行，无不败露。天下焉有丧灭伦常，犹得托名于理学之林，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？今内外臣工等合词陈奏，朕思吕留良之罪，从前谕旨甚明。在天理国法，万无可宽。然天下至广，读书之人至多，或者千万人中，尚有其人，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。朕慎重刑罚，诛奸锄叛，必合乎人心之大公，以昭与众弃之之义。至其所著书集，臣工等奏请焚毁，复思吕留良不过盗袭古人之绪余，以肆其狂诞空浮之论。有识见者，固不待言。即当日被其愚惑者，今亦自然窥其底里而嗤笑之也。况其人品术若此，其言更何可取。今若焚灭其迹，假使毁弃不

尽，则事属空文。倘毁弃尽绝，则将来未见其书者，转疑伊之著述，实能阐发圣贤精蕴，而惜其不可复得也。即吕留良书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语，伏思我圣祖仁皇帝，圣德神功，际天蟠地，如日月之照临宇宙，万古为昭，岂吕留良所能亏蔽于万一乎？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，各学生监等，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判质煮墙荆 磷勇酪阉姓毒觥 鋹所著文集诗集日记，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钞录者，尽行燬毁之处。著秉公据实，作速取具，该生监等结状具奏，其有独抒己见，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，不可阻挠隐匿。俟具奏到日，再降谕旨。

雍正十年十二月，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，梟獍性成，心怀叛逆，与吕留良党恶共济，诬捏妖言，实复载所难容，为王法所不贷。严鸿逵应凌迟处死，已伏冥诛，应戮尸梟示。其祖父、父、子、孙、兄、弟，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，十六以上，皆斩立决。男十五以下，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，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。财产入官。沈在宽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，猖狂悖乱，附会诋讪。允宜速正典刑，凌迟处死。其嫡属等，均照律治罪。又吕留良案内黄补庵，自称私淑门人，所作诗词，荒唐狂悖，车鼎丰、车鼎贲刊刻逆书，往来契厚，孙用克阴相援结，周敬舆甘心附逆，私藏禁书。黄补庵应拟斩立决。妻、妾、子、女给功臣之家为奴，父、母、祖、孙、兄、弟流二千里。车鼎丰等但拟斩监候。又吕留良案内，被惑门徒房明畴、金子尚应革去生员，杖一百，佷妻流三千里。陈祖陶、沈允怀、沈成之、董吕音、李天维、费定原、王立夫、施子由、沈斗山、沈惠侯、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朱霞山、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，张圣范、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，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，

应无庸议。得旨：严鸿逵著戮尸梟示，其孙著发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，沈在宽著改斩立决，黄补庵已伏冥诛，其嫡属照议治罪。车鼎丰、车鼎贲、孙用克、周敬舆具依拟应斩，著监候秋后处决。房明畴、金子尚俱著金妻流三千里。陈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责完结。张圣范、朱羽采、朱霞山、朱芷年著释放。

○谢济世之狱

观谢济世之狱，而叹监谤之道，至矣尽矣。录上谕一节，俾见当时雄主所以操纵臣民之作用焉。

雍正七年七月辛丑，谕内阁：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，注释《大学》，毁谤程、朱。参奏前来，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，意不止毁谤程、朱。乃用《大学》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，言人君用人之道，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。其注有拒谏饰非，必至拂人之性，骄泰甚矣等语。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。朕即位以来，于用人之际，至公无私，不惟可以自信，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。即以田文镜、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，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，为内阁侍读学士。朕从未识其面，亦并未知其姓名。因雍正元年，伊奉差祭告华山，回京陛见，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，急切陈奏，备极周详，朕以山西被灾，其时之巡抚德音，身在地方，匿不奏闻。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，念切民瘼，直言不隐，其忠君爱国之忱，深属可嘉，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。伊到彼果能尽心办理。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，令与诺岷和衷共济。嗣因河南诸事废弛，调任河南布政使，未几擢为河南巡抚，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。一二年间，深加信任，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

不能先乎？又如李绂、蔡珽与黄振国、邵言纶、汪𣵿等结党行私，营求报复，而谢济世奸恶狼戾，听其指挥。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贿，任意诬蔑。借直言敢谏之名，行其排挤倾陷之计。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，立即洞烛其奸，拿交刑部审问。朕尚未忍置之重典，著令革职，发往军前，效力赎罪。一时在廷诸臣，无不以为至公至当。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乎？至于朕心，并无私好私恶，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，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，何尝预存成见于胸中？即如引见各官，有见其才具似优者，亦令该上司试看。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，亦令该上司试看，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，不必存迎合瞻顾之念。是以各员莅任之后，或朕旨曾奖其优，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。或朕旨以为平常，而督抚保奏，称职者亦有之。朕未尝以一己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，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，从未尝以朕之好恶，漫为迎合也。朕之用人，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，可谓之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乎？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，则肆行诬参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，以及常护钻营之李绂、蔡珽、邵言纶、汪𣵿等，则甘听其指使，而为之报复，乃直颠倒是非，紊乱黑白，好恶拂人之性者矣。天理国法，所不能容。灾已逮身，而犹不知省惧，何其谬妄至于此极？夫拒谏饰非之说，乃朕素所深戒。然必责难陈善，忠言说论，而后可以谓之谏。若乃排挤倾陷之私言，奸险狡恶之邪论，岂可以直谏自居，而冀朕之听受耶？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，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？为朕躬进谏者何言？朕所拒者何谏？所饰者何非？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，诬陷良臣之外，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？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，从宽令其效力。乃仍怀怨望，恣意谤讪，甚为可恶。应作何治罪之处，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。

○胡中藻之狱

康熙间屡次文字狱，虽文网深密，然因天下未定，其所对付者，亦半属实意为难之人。霸者为自卫计，尚非得已也。至如乾隆间胡中藻一案，观其成谳之词，真可以“莫须有”三字尽之矣。且在彼时，何必更作如是手段？而竟作如是手段者，则高宗与圣祖世宗才略之高下，亦可见耳。今掇拾诸上谕，记其始末如下：

乾隆二十年三月，上召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谕曰：“我朝抚有方夏，于今百有余年。列祖列宗，深仁厚泽，渐洽区宇，薄海内外，共享升平。凡为臣子，自乃祖乃父以来，食毛践土，宜共胥识尊亲大义，乃尚有出身科目，名列清华，而鬼蜮为心，于语言吟咏之间，肆其悖逆，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，实非人类中所应有。其所刻诗，题曰《坚磨生诗钞》，坚磨出自鲁论，孔子所称磨涅，乃指佛肸而言。胡中藻以此自号，是诚何心？从前查嗣庭、汪景祺、吕留良等诗文日记，谤讪讠寿张，大逆不道。蒙我皇考申明大义，严加惩创，以正伦纪而维世道。数十年来，意谓中外臣民，咸知儆惕，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。即检阅嗣庭等旧案，其悖逆之词，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。如其集内所云“一世无日月”，又曰“又降一世夏秋冬”。三代而下，享国之久，莫如汉唐宋明，皆一再传而多故。本朝定鼎以来，承平熙皞，盖远过之。乃曰又降一世，是尚有人心者乎？又曰：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。加浊字于国号之上，是何肺腑？至《谒罗池庙》诗，则曰“天匪开清泰”。又曰“斯文欲被蛮满洲”。俗称汉人曰蛮子，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，此不过如乡籍而言，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

是也。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，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，亦将有罪乎？再观其“与一世争在丑夷”之句，盖可见矣。又曰：“相见请看都盗背，谁知生色属裘人？”此非谓旃裘之人而何？又曰：“南斗送我南，北斗送我北。南北斗中间，不能一黍阔。”又曰：“再泛潇湘朝北海，细看来历是如何？”又曰：“虽然北风好，难用可如何？”又曰：“至云揭北斗，怒窍生南风。”又曰“暂歇南风竞”。两两以南北分提，重言反复，意何所指？其《语溪照景石》诗中，用“周时穆天子，车马走不停”及“武皇为失倾城色”两典故，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？特欲藉题亦以寓其讥刺讪谤耳。至若“老佛如今无病病，朝门闻说不开开”之句，尤为奇诞。朕每日听政，召见臣工，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？又曰：“人间岂是无中气？”此是何等语乎？其《和初雪元韵》则曰：“白雪高难和，单辞赞莫加。”单辞，出《尚书·吕刑》，于咏雪何涉？《进呈南巡诗》则曰“三才生后生”，今日天地人为三才，生于三才之后，是为何物？其指斥之意，可胜诛乎？又曰：“天所照临皆日月，地无道里计西东。诸公五岳诸侯渎，一百年来俯首同。”盖谓岳渎蒙羞，俯首无奈而已，谤讪显然。又曰“亦天子亦莱衣”。两亦字悖慢已极。又曰“不为游观纵盗骊”。八骏，人所常用，必用盗骊，又何所取？又曰“一川水已快南巡”。下接云：“周王淠彼因时迈。”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，谓朕不之觉耳。又曰“如今亦是涂山会，玉帛相方十倍多”。“亦是”二字，与前“亦”字同意。其颂蠲免，则曰：“那似偏灾今降雨，况如平日佛燃灯。”朕一闻灾歉，立加赈恤，何乃谓如佛灯之难睹耶？至如孝贤皇后之丧，乃有“并花已觉单无蒂”之句。孝贤皇后，系朕藩邸。时皇考世宗宪皇帝，礼聘贤淑，作配朕躬，正位中宫，母仪天下者，一十三年。然朕亦何尝令有干与朝政，

骄纵外家之事？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。至大事之后，朕恩顾饰终。然一切礼议，并无于会典之外，有所增益，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，自谓殊似晋人，是已为王法所必诛。而其诗曰“其夫我父属”，妻皆母道之女。君君一体，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？君应冠于父上，曰父君尚不可，而不过谓其父之类，而已可乎？帝后也，而直斥曰其夫曰妻，丧心病狂，一至于此，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？他如《自桂林调回京师》，则曰“得免我冠是出头”。伊由翰林，洊擢京堂，督学陕西，复调广西，屡司文柄。其调取回京，并非迁谪，乃以挂冠为出头，有是理乎？又有曰“一世璞谁完？吾身甑恐破”。又曰“若能自主张，除是脱 量锁。”又曰“一世眩如鸟在笱”。又曰“虱官我曾惭”。又曰“天方省事应闲我”，又曰“直道恐难行”。又曰“世事于今怕捉风”。无非怨怅之语。《述怀》诗又曰：“琐沙偷射域，饶舌狠张箕。”《贤良祠》诗又曰：“青蝇投昊肯容辞？”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？伊在鄂尔泰门下，依草附木，而诗中乃有“记出西林第一门”之句。攀援门户，恬不知耻。朕初见其进呈诗文，语多险僻，知其心术叵测。于命督学政时，曾训以论文取士，宜崇平正。今见其诗中，即有“下眼训平夷”之句。下眼并无典据，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，以为识力卑下亦可，巧用双关云耳。至其所出试题内，《孝经》义有“乾三爻不象龙”说。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，故象传言，时乘六龙以御天，如伊所言，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？乾隆乃朕年号，龙与隆同音，其诋毁之意可见。又如“鸟兽不可与同群”，“狗彘食人食”，“牝鸡无晨”等题，若谓出题欲避熟，经书不乏闲冷题目，乃必检此等语句，意何所指？其种种悖逆，不可悉数。十余年来，在廷诸臣，所和韵及进呈诗册，何止千万首。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，朕俱置而不论，从未

尝以语言文字责人。若胡中藻之诗，措词用意，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。夫谤及朕躬犹可，谤及本朝则叛逆耳。朕见其诗已经数年，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，待其参奏。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，并无一人参奏。足见相习成风，牢不可破。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，正尔嚣风，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。且内廷侍从、曾列卿贰之张泰开，重师门而罔顾大义，为之出资刊刻。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，历任巡抚。见此悖逆之作，不但不知愤恨，且丧心与之唱和，引为同调。其罪实不容诛。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，用俾天下后世，共知炯鉴。张泰开著革职，拿交刑部。胡中藻、鄂昌，已降旨拿解来京。俟到日，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。公同逐节审定拟具奏。

庚子谕：满洲风俗，素以尊君亲上，朴诚孝敬为根本。自骑射之外，一切玩物丧志之事，皆无所渐染。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，往往稍解章句，即妄为诗歌，动以浮夸相尚，遂致古风日远。语言诞慢，渐成恶习。即如鄂昌，身系满洲，世受国恩，乃任广西巡抚时，见胡中藻悖逆诗词，不但不知愤恨，且与之往复唱和，实为丧心之尤。今检其所作《塞上吟》，词句粗陋鄙率，难以言诗。而其背谬之甚者，且至蒙古为胡儿。夫蒙古自我朝先世，即倾心归附，与满洲本属一体，乃目以胡儿。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？非忘本而何？又如鄂昌家查出《塞尔赫晓亭诗钞》，内有《作明泰妾杜贞姬》诗一首。初似明泰身遭不幸，本非其罪者。及查阅原案，始知明泰身为协领，侵独兵丁钱粮，其罪本即应正法。我皇考世宗宪皇帝，如天之仁，将伊解送宁夏，永远枷号，实属格外宽典。而塞尔赫所作诗序，但知赞其妾为贞姬，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。此直变乱黑白，不自知其矫诬矣。究之明泰，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。夫以如此恶人，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？夫满洲未经读书，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。

即孔门以诗书垂教，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。若读书徒剽窃浮华，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，岂孔门垂教之本意？况借以诋呵讥刺居心，日就险薄，不更为名教罪人耶？此等弊俗，断不可长。著将此通行传谕八旗，令其务崇敦朴旧规，毋失先民矩矱。倘有托名读书，无知妄作，侈口吟咏，自蹈嚣陵恶习者，朕必重治其罪。

四月丁未，谕军机大臣等：胡中藻自回籍后，所作诗稿甚多，且其词气与刻集迥异。必由先已知觉。讯据胡中藻有广信府亲戚张绍衡，自京捐纳回南，至伊家吊唁。见书架上有《坚磨生诗集》刻本，因说此书以达御览。胡中藻问尔何所闻，张绍衡答以裘曰修即曾说过之语。遂遣人询之。伊兄张绍渠据称张绍衡上年三月回家，此后并未来京，亦未到伊任所等语。著传谕胡宝珠，即速提张绍衡到省。审讯张绍衡是否闻之，裘曰修如何向伊说知。是否属伊传语胡中藻，伊如何传述之处，一一讯取确供。在张绍衡不过无心传述，有则不必躲避，无亦不可妄承，或伊别有来历，总期讯出实在情形，使此事明晰。如张绍衡能将实情供出，尚无大咎。若枝梧掩饰，亦必终于水落石出。该抚先将供情，由驿驰奏。一面将张绍衡押送来京质对。再胡中藻在本籍曾刻诗斗方，诋毁地方官，其中必有关涉朝廷处。何以查送杂稿诗片内，并无此件？该省如有人收存，务须查追。再胡中藻家中书籍，内有《预纪略》二本，《复斋录》六本。查系何等书，有无关系，一并送来。

甲寅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，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，覆载不容，合伙大逆凌迟处死。该犯的属，男十六岁以上，皆斩立决。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，乃敢助资刊版，出名作序，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。其与逆犯酬答之相冒，俟拿解到日，另议谕，朕御极以来，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。在廷诸臣，和进

诗册，何止数千万篇。其中字句谬戾，亦所时有。朕皆不加指摘。何恶于胡中藻一人，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，连篇累牍，无非谤讪诋毁之词。不惟谤及朕躬，且敢诋毁国家。本朝抚临中夏，百有余年，凡天下臣民，自祖父以至孙子，世蒙教养深恩。而胡中藻逆伦悖叛，乃至于此，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。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，大示义正，意狂诞之徒，必应知所畏惧，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，自不得不申明宪典，以警嚣顽。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，公同确讯，屡经面对，金请处以极刑，自属按律定拟。朕意肆市，已足示众，胡中藻免其凌迟，著即行处斩，为天下后世炯戒。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，文辞险怪，人所共知。而鄂尔泰独加赞赏，以致肆无忌惮，悖慢于寿张。且于其侄鄂昌，叙门谊，论杯酒。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，适以酿成恶习耳。胡中藻依附师门，甘为鹰犬。其诗中谗舌青蝇，据供实指张廷玉、张照二人。可见其门户之见，牢不可破。即张廷玉之用人，亦未必不以鄂尔泰、胡中藻辈为匪类也。鄂尔泰、张廷玉，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，不能大有为耳。不然，何事不可为哉？大臣立朝，当以公忠体国为心。若各存意见，则依附之小人，遂至妄为揣摩，群相附和，渐至判若水火。古来朋党之弊，悉由于此。鄂尔泰为满洲人臣，尤不应蹈此恶习。今伊侄鄂昌，即援引世谊，亲昵标榜，积习蔽锢，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。使鄂尔泰此时尚在，必将伊革职，重治其罪，为大臣植党者戒。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，不准入祀。其配享太庙，系奉皇考遗诏遵行，与见在准张廷玉之配享相同，应仍照旧。张泰开本一庸懦无能之人，其出资刊刻，由被勒索。而序文又俱系胡中藻自构，张泰开著从宽免其治罪，即著释放，仍在上书房行走，效力赎罪。胡中藻之母，年已八十。其孙亦在幼稚，及伊弟胡中藩等，著从宽免其缘坐。其胡中藻诗案内，一应干

涉之人，除鄂昌俟解京之日，另行审结外，其余俱著加恩，一概免其查究。至于李蕴芳，身为县令，乃以检验为害，反复嗟怨，甚属狂悖。该抚现以贪婪题参革职俟审，拟到日再降谕旨。余依议。

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，兼禁挟仇诬告诗文，以息恶习一摺云：“古者大史采诗，以观民风。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，俗尚之美恶。即《虞书》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，使下情之上达也。降及周季，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。惟是行僻而坚，言伪而辨，虽属闻人，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，诚恶其惑众也。往者造作语言，显有背逆之迹，如罪人戴名世、汪景祺等，圣祖世宗，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，非得已也。若夫赋诗作文，语涉疑似。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，《游虎邱》作诗。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，圣祖明示九卿，以为古来诬陷善类，大率如此。如神之哲，洞察隐微，可为万世法则。比年以来，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，往往挟睚眦之怨，借影响之词，攻讦诗书，指摘字句。有司见事风生，多方穷鞫，或致波累师生，株连亲故，破家亡命。甚可悯也。臣愚以井田封建，不过迂儒之常谈，不可以为生今反古；述怀咏史，不过词人之习态，不可以为援古刺今。即有序跋偶遗纪年，亦或草茅一时失检，非必果怀悖逆，敢于明布篇章。使以此类，悉皆比附妖言，罪当不赦，将使天下告讦不休，士子以文为戒，殊非国家义以正法，仁以包蒙之意。伏读皇上谕旨，凡奏疏中，从前避忌之事，一概扫除。仰见圣明，廓然大度，即古敷奏采风之盛。臣窃谓大廷之章奏，尚捐忌讳，则在野之笔札，焉用吹求？请敕下直省大吏，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，现在不准援赦者，条例上请，以俟明旨钦定。嗣后凡举首文字者，若无的确踪迹，以所告本人之罪，依律反坐，以为挟仇诬造者戒。庶文字之累可

蠲，告讐之风可息矣”云云。观于此而知当时文字之狱，其层见迭出者，殆难数计。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，如上谕中所举各条，任翻何人集中，此等语句，其孰能免？而坐是夷及宗族，牵连钩党，凡有血气，其谁不自危？曹氏所谓井田封建，述怀咏史者，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。无惑乎举世之学者，舍最无用之学术外，不敢研究也！龚定庵尝云：“积数百数十年之力，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。既殄既弥既夷，顾乃藉祖父之余荫。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，不亦暮乎！”呜呼！非一朝一夕之故，所从来渐矣。抑世宗不杀曾静之身，不焚吕留良之书，而且以其供词刊布，颁示天下。其操纵一世之妙用，实有可惊者。嘻。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，类此者殆希也。